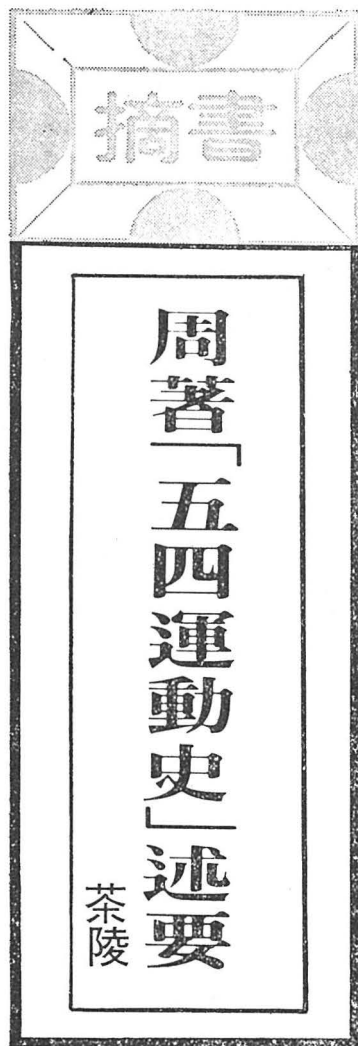


五四運動時文學與思想的鼓發，起於二十一條事件過後不久，當時中國的政局陷於垂危之境。從一九一五年冬到一九一七年夏，舉國受到兩次帝制運動的騷擾，反動官僚們忙於準備擁主登基，舊士紳們也不免歪曲地宣揚陳舊的傳統儒家教條，為帝制運動提供了慣有的理論基礎，在不識字與未受教育的羣衆中，擴散「真龍天子」重返的謠言。初建的民國就這樣，外受國恥之辱，內遭軍閥和舊官僚士紳陰謀之危。處此亂局中的年輕知識份子，伴着逐長的憂患意識，在尋找救國之道。

萌芽期的文學與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二）

此時許多歸國的知識份子帶回了新觀念。陳獨秀於一九一五年由日本返，是年秋天他創辦「新青年」雜誌，為一項基本改革運動標出了起點。蔡元培於一九一六年自法國歸，次年起他對北大進行改組，增強了這項基本改革運動的實力。胡適也於一九一七年夏從美國歸來，加入了新知識份子的領袖羣。他們奮力和舊士紳文人論戰，對手們只能微弱與消極的反抗，然因軍政當局固守着「傳統的倫理和制度」，新知識份子仍苦於軍閥政府的壓制。一九一六年多，日本開始對華採取新策，企圖收買中國政府以增其影響力，此舉也正合北洋政權的需要，後者想用武力統一全國於其治下。但民衆反日的情緒依然持續，日本與初萌的中國經濟間的利益衝突，也隨着大戰的進展而加深。在這種情狀下，日本寺內正毅與北洋段祺瑞兩政權的密切關係（先是財政，然後軍事），立刻引起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懷疑，結果當知識份子開始逐漸運用外交問題抨擊政府時，新改革運動也獲得民衆高漲的反日情緒所鼓舞，而成爲愛國青年致力的焦點。

「新青年」雜誌在五四期間扮演了特別重要的角色。陳獨秀創辦該誌時的環境是不利的，出版自由受到北洋政府衆多的苛律限制，辛亥革命後一度快速成長的中國出版業，此時因受高壓而大量萎縮。在這種困難的政治局勢下，陳獨秀避免直接地論政，雜誌宣稱旨在改革青年的思想和行爲，而非發動政治批評。話雖如此，尖銳反帝的評論却在在可視，尤其是「通信」、「國內大事記」、「國外大事記」等欄。

陳獨秀和胡適所見中國政治難題的根源，要比一般人的平思來得深刻。胡適主要致力於學術、教育與文學領域的改革，陳獨秀則強調有必要摧毀腐朽的傳統和喚醒青年的意識，因為後者保有建設新中國的希望。他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表示，中國需要青年發揮人間固有的智能，抉擇種種思想——何者新鮮活潑適於今世之爭存？何者陳腐朽敗不容留置於腦？他建議採取不妥協不猶疑的態度，如快刀斬麻的處理此難題，並提出六項原則來指導青年的行動：「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陳撰該文的基本目的即在攻擊保守主義，並倡推倒沒有價值的傳統。他強調寧忍過去國粹的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民族因不適世界的生存歸趨消滅，因為帝制運動和其他守舊

集團利用傳統尤其是儒家的言論，以支持彼等的「信仰」，只批評其政治的膚淺不如摧毀根基來得有意義。若不此之圖，在這個社會和經濟已停滯了數世紀的中國，就沒有積極建設的可能。

此種批判傳統和喚醒青年的熱切計畫，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都是由陳獨秀和幾位撰稿人推行。從一九一五年到次年歲末，陳的活動集中於上海，當時海內外新領導階層的知識份子，如吳稚暉、胡適、李大釗、高一涵和劉半農等，彼此的關係是偶然的，也沒有正式的組織，但到一九一七年初，文學革命開始成形了。繼袁世凱擔任大總統的黎元洪，於元旦前一週任命蔡元培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是新知識界的精神領袖，又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及自由主義者之一，在他的鼓勵和維護下，新知識份子的領導人物們聚集於北大，改革運動也因之而能向前邁進。

蔡元培在北大推動的各項改革，對五四運動的重要性與陳獨秀的創辦「新青年」相同。這所大學源起於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於一八九五年創設的「強學會」，但到一八九八年五月才以京師大學堂為名實際成立，那時所有學生都是選自高級官員或通過科學者。民國肇建後再改名為北大，嚴復做了七個月的校長。一九一九年初以前，北大是僅有的三所官辦大學之一，且是唯一一位於首都由中央政府供應全部經費者。它被視為全國高等教育的領導學府，由四個學院組成：文學院包括中文、哲學、英文、法文和歷史等系，理學院包括物理、化學、數學和地質等系，法學院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和商學等系，工學院包括土木和礦冶兩系。蔡元培任校長後，北大頗見擴充，一九一八年的預算幾為其他公立大學的六倍，次年初全校教職員約有二百五十名以上，在學學生也達二千四百多人。

過去北大以守舊的傳統聞名，學生們把它當做晉身之階而非學習之所，教授也多來自官場，品評的依據是官階而非學問，他們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則被稱為「老爺」。師生在道德方面都聲名狼藉，他們常耽溺於賭博或結伴嫖妓，大學以「探艷團」、「賭窟」和「浮艷劇評花叢趣事之策源地」等名世，極大的變化要待蔡元培接長後才發生。一九一七年蔡在就任演說中指出，學生進大學的目的是在求學，不應是升官發財

。過後他又表明了辦理北大的三項政策：一、大學是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不僅意謂着介紹西方文明，而且還要創新；不僅在於保存「國粹」，還要以科學方法來研究它。二、學生不應視大學為舊科舉制度的代替物，也不應忽略己身專長以外的學科。三、大學應保有學術自由，各種不同的學說，如哲學裏的唯心論和唯物論，文學裏的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經濟學裏的干涉論和放任論，倫理學裏的動機論和功利論，以及基本論裏的樂觀派和厭世說——只要它們有嚴格的學術立場，皆可在大學中自由表達。

在這些自由和進步原則的基礎上，蔡元培推行了許多實際的改革，不同觀點的教授被請進北大，各種研究和輔導小組也在教授團裏成立，大學主要是由教授而非行政人員或官員來治理，學生也獲允以個人身份參加政治活動，校方可對他們加以勸告，但不能干涉其自由選擇——這正與當時北京政府的政策相反。又鼓勵學生自治，產生了研究、演講、討論、出版、休閒、社會服務、體育等社團活動，學生銀行、消費合作社和博物館也相繼成立起來，一種類似在法國試行過的工讀制同時在北大奠基。平等的精神引介到該校，過去存梗於師生之間，以及師生與校役工人之間的界限，獲得相當程度的解除。學生的道德水準也大為提高，一九一八年「進德會」成立，所有會員都加入不嫖不賭不納妾的公約，其中第二小組成員更同意不做官不當議員，他們通過了罰則並選出監督人。不做官不當議員這兩項戒約，反映出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影響，以及新知識份子對舊官僚的鄙視，在他們眼裏，舊官僚與軍閥是萬惡之源。

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行動中，最有意義的大概是對不同意見的兼容並存。做為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的會員之一，蔡却不允許黨派和政治影響其選聘教授。一九一二年被孫中山先生的政府任命為教育總長時，他曾說明理想的制度觀，就是「超軼政治之教育」，而非「隸屬於政治之教育」。關於教育的目的，他提出五項原則：一、實施普及的軍事教育，以避免軍國主義者獨佔軍力；二、以實利主義的教育來改善人民生活；三、實施以互助為基礎的道德教育；四、以「世界觀」教育來提昇一種宇宙觀；五、從康德學說中的「美感教育」出發，藉着美感的鑑賞，將人由現象世界帶領到實體世界，最後就是要以美學來代替宗教。在論及第四項時蔡元培說

：「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桔其心，而惟時時懸一無方體無終始之世界觀以爲鵠。」他到北大任職以後，重申所有在理性基礎上可以持續的言論，都能在大學裏自由宣揚，結果北大教授中包括了保皇黨、守舊派和復古論者，更有自由主義者、激進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一位作家後來說：「於是很自然地，所有最富於生氣和有天才的年輕一代中國知識份子都羣集在他的領導之下。結果在幾年之內創造出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多產的思想生活，幾乎在世界學術史上都找不到前例。」

這種教育方面的自由政策，造成新舊兩派在北大公開論戰，且使新知識份子們得以聯合。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白話詩和文學革命的先驅人物，都應邀到北大任教，胡適返國後也在北大擔任迥異傳統見解的中國哲學史課程。魯迅、周作人、吳虞、高一涵、陶孟和、陳大齊、馬寅初和王星拱等，也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對北大學生發揮了深遠的影響。一九一八年十月，陳獨秀和李大釗更創辦了「每週評論」。

一九一八年冬，當地一羣卓越的學生爲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學運動，便創辦了「新潮」。該誌初由傅斯年、顧頡剛和徐彥之創議，後來羅家倫、潘家洵和康白情也加入，他們多屬喜好文史的學生。靠着陳、李兩教授的幫助，這份出版品獲得了大學財政和物質的支援，胡適也成爲他們的顧問。學生們提出了「新潮」應採的三要義：批評的精神、科學的思考、革新的文辭。因此，他們支持「新青年」和「每週評論」提倡的改革。一九一九年元旦該誌創刊，立刻受到國內文學青年的歡迎。出版該誌的「新潮社」，是北大學生組成的一個小型團體，其中大多數都成爲五四事件時的學生領袖，並對近代中國思想和社會的發展扮演過重要角色。除了前述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六人外，還包括毛子水、江紹原、汪敬熙、吳康、何思源、李小峯、龔平伯、郭紹虞、孫伏園、孫福熙、張申府、葉聖陶、楊振聲、劉秉麟、孟壽椿、馮友蘭、朱自清等。

新青年集團與北大聯合之後，新知識份子的觀點享有隆譽並受到更廣泛的注意，部分是因北大在中國的學術領導地位，部分是因學生日增的支持。但這種聯合只是暫時的，領導人物的見解和興趣原就差異頗大，這可以陳獨秀和胡適爲好例子說明：陳獨秀的興趣集中於政治和社會事務，胡適則和許多其他的北大教授一樣，更

有志於文學和教育的改革。當他們於一九一七年為升高新運動以對抗舊士紳時，彼此有一種寬鬆的諒解，即改革運動將着重於非政治性的活動。此項聯合實基於一般性的和不謹嚴的觀念，如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民主及科學等。後來陳獨秀察覺到段祺瑞政府的舉措越發令人難忍時，就無法自抑的批評起來。一九一八年以後他轉為更激烈，並開始支持羣衆運動，「每週評論」形成一種小型而尖銳的政論雜誌，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其他自由主義者則與此相反，逐漸變為更保守及更溫和，不願捲入政治中，不過直到五四事件以後，這項聯合才告破裂。

儘管聯合的本質有異，新知識份子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間，確曾致力於思想和文化的改革。陳獨秀在就任文科學長之前，已與易白沙和吳虞發展了反孔教的途徑，並與胡適協力形成文學革命的觀念，他們都是「新青年」的撰稿者。陳在就職時說：「僕對於吾國國學及國文之主張，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國民文學。誓將此二義遍播國中，不獨主張於大學文科也。」這項計畫同時強調倫理和文學的改革，為抵於成，新知識份子不僅嘗試介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也重估和批評中國的傳統。此非由任何一人策畫或指導，而是代表了一羣意見分歧者的共通立場。

「新青年」在五四事件之前，已討論過許多重要問題，顯示出五四運動第一階段中知識份子的心態。該誌主要反對舊思想和習俗的型模，並提倡新學。它反對君主專制及少數人享受政治特權，提倡民主政治、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後來又顧及社會主義；它反對傳統的倫理和大家庭制，主張社會中個人地位的平等，提倡西方的小家庭制和戀愛婚姻自由。隨後幾期它提倡文學革命及鼓勵語言改革，討論國字羅馬化和使用世界語的問題，並介紹標點符號。它又反對舊迷信和宗教，擁護科學技術和不可知論。為反對過去很少受到懷疑的傳統儒學，它建議重估所有的經典。雜誌的作者們要求教育應鼓舞個性的發展，而不應只在維護教育工作者者的傳統權威。最後，它企圖促進知識份子領導力量的聯合，經由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改革來反抗軍閥統治。

新思想領袖們的基本信條可以簡化為「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陳獨

秀於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和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和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由於受到教授和「新青年」的啓發，北大等校學生對新思潮有了更明確的瞭解，並在新思想運動中變得更加活躍。「新潮社」諸人都是先鋒者，他們把這個運動當成一種「思想革命」或「社會革命」，且力促其讀者將世界上的「新思潮」在國內提介推展，他們指出這運動的精神應該是批評精神，應以尼采的警語——「重新估量一切」(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為準則。更重要的，他們發願協助全國的中學生，為求精神的解脫而戰，傅斯年執筆的「新潮發刊旨趣書」裏就強調這一點：「觀察情實，乃覺今日最危險者，無過於青年學生。邇者惡人模型，思想厲鬼，遍於國中，有心人深以為憂。然但不能不傳謬種，則此輩相將就木之日，即中國進於福利之年。無如若輩專意鼓簧，製造無量惡魔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長此不墮，真是殷憂。本誌發願協助中等學校之同學，力求精神上脫離此類感化。於修學立身之方法與徑塗，盡力研求，喻之於衆。……總期海內同學去遺傳的科學思想，進於現世的科學思想；去主觀的武斷思想，進於客觀的懷疑思想；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

新潮社領袖的社會革命觀，顯示出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但若斷言他們是布爾希維克主義者或馬克斯主義者，却是不對的。他們的觀點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含糊混合體，羅家倫認為革命以後二者必定相輔而行，且會更加接近；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則是互濟的，不是背馳的力量，「此後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要以雷厲風行的手腕，來摧殘一切的個性；乃是以社會的力量，來扶助那班稚弱無能的人，來發展個性」。他相信，這就是新潮的真正意義。

當新知識份子的聯合正在形成之時，一個反對團體在北大出現，包括了一些保守派的教授、研究工作者和

學生，例如劉師培、黃季剛、林損、辜鴻銘和馬鈺倫等。他們以「國故」雜誌為場地，提倡文言文、孔學與舊倫理，但在思想宣揚上頗不見效，其出版物欠缺可讀性，有時又不合邏輯，對大多數的中國青年不具吸引力，這與新知識界領袖們的寫作能力成一大對比。後者多為優秀的評論家，陳獨秀的論文熱情有力，胡適的文體明白易解，魯迅的短文和小說像一把雙鋒的匕首，周作人的散文則生動如對談。其他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的師生領袖們如錢玄同、劉半農、羅家倫和傅斯年等，也多為雄辯有力的作家。此外還有燦如星光的年輕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從這次運動中升起。新知識界的領袖不僅在西學方面，甚至在國學領域上也勝過舊學者（嚴復和辜鴻銘是舊派兼及中西的少數例外），其中許多人的白話文和古文俱優。而舊派不是只精通古文，就是過傲而不使用白話文，偏偏白話文已成為遠較有效的書寫媒介了。

在大學之外有兩位名家支持反對派，即嚴復和林紆。嚴復在當時已變為保守，同時反對學生運動和新文學新思想運動，認為只有回歸古中國的倫理文化和拒絕西方的影響，才能挽救國危，這與他自己在上世紀末的看法相反。他並宣稱古文較白話文更典雅，更富暗示意味，新文學運動更將由於「不合理」，而在生存競爭下迅速消亡，因此積極的反對是多餘和不必要的。這樣大學外只剩林紆一人具有影響力而支持反對派了，一九一九年二月和三月，林在上海「新申報」發表「荊生」與「妖夢」兩篇小說諷刺新思想和新文學運動的領袖。此時他又寫信給蔡元培，控訴北大「覆孔孟，剷倫常」，以及「盡廢古書，行用土語」。關於前者，蔡元培答覆說：一、經查北大教授未曾教學生「覆孔孟」；二、教授在外發表評論言論，本與大學無關，但即如「新青年」雜誌，也只在反對依托孔子而擁君主體制和攻擊新思想運動者；三、無一教授曾教學生反對倫常，相反地更有嚴謹的「進德會」組織；四、教授在外也未發表剷倫常的意見。關於後者，蔡元培表示：一、北大並未盡廢古文，許多教科書及講義仍用古文書寫；二、課堂上解釋古書須用白話，否則學生難懂；三、提倡白話文的教授都能作古文，非以白話文藏拙。此外，他又說明北大校政兩要義：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

亦不能代負責任。

保守派的反對自始就註定會失敗，因為他們爭取政府干涉的努力多於爭取民衆的支持。他們企圖說服安福系控制下的國會彈劾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並要求解聘自由進步的教授如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等。彈劾案曾在國會提出，但並未通過，因為政府害怕學生和輿論的強烈反對。然而到一九一九年春天，干涉的謠言變得更重，陳獨秀因此辭去文科學長之職。假如五四事件沒有發生，北大等校的新思想運動可能被軍閥政府鎮壓了。

即在五四事件以前，新運動已不僅吸引年輕的知識份子，且獲得各政黨中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份子的同情。新思想的領袖如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錢玄同和蔣夢麟等，都是國民黨員，雖然該黨在運動初期未曾採取任何立場，但有些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五四時期，國民黨是唯一試圖推翻北京政府的有實力政黨）。不止此也，新思潮還飽受溫和的保守派「研究系」之支持，研究系是由進步黨衍生而來，兩者都由名報人兼改革家梁啟超領導。

直到此時，新改革運動的活躍份子主要是北京的師生們，新知識份子與新商人及工業家之間的關係還不緊密，軍閥政府和舊士紳聯合基礎上的反對派，也尚未與工商界發生衝突。事實上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新知識份子與舊勢力之間的衝突，主要是觀念而非行動，但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段祺瑞的政府與寺內正毅的日本政府之間變得更密切，這個情勢就開始改變。中國保守集團的親日習性，導致新知識份子與一般民衆攜手，後者的愛國心已被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及隨後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舉止所激，這種情緒在一種聯合「救國」運動中逐漸化為行動，而於一九一八年變得更為增強。

一九一七年一月到次年九月間，日本予段祺瑞政府鉅額的「西原借款」，使段越發依賴日本。一九一八年三月到五月，雙方又商議秘密性的「中日軍事共同防禦協定」，依此日本有權在中國東北的北部和外蒙駐軍，有權使用中國的軍事地圖，有權在中國陸海軍中任用日籍教官等。該年夏天國人要求公佈條約，在日本和法國

的中國留學生也示威抗議秘密外交。稍早五月時留日學生即開始集體回國，北京政府立刻頒佈命令迫彼等返日，學生們却不顧威脅留在上海，其中曾琦、王兆榮和喻義等創辦「救國日報」，呼籲青年加入救亡工作。同年六月底，活躍的知識份子和留日學生，包括王光祈、曾琦、李大釗、陳愚生、雷寶菁、張尙齡和周蕪等，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國學會」，當時提倡國家主義，並提出四項目標：一、振作少年精神，二、研究真實學術，三、發展社會事業，四、轉移末世風氣。對於社會事業，他們意指以改革和新學爲目的之教育，以及新的工商業。「少中」只是政府親日政策下受激而發展的救國運動之一，這種政策越顯現，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與民衆反日愛國團體之間的接觸也就越密切。

一九一八年五月，民衆反對「中日軍事互助協定」的情緒已達高潮，二十一日兩千多名北京的學生，包括來自北大、北京高等師範、法政專校和工業專校等，舉行示威抗議協定之簽字，他們到馮國璋的總統府詢問協定內容，並要求予以廢除。當馮保證其政府未曾也將不做違反國家利益的任何事時，學生的情緒和緩下來。

其他許多城市的學生也有過類似的示威，包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雖然這次運動迅速平息，它着實影響了不少商人，日後他們舉行許多集會，並拍電給政府指責段祺瑞。這些學生五月示威和請願的首要意義，是標明了新知識份子和社會其他力量大規模合作的開端，從某種意識來說，可謂五四事件的預演。

該年夏天北京學生派代表到上海，立即合組了學生愛國會，後改名爲學生救國會，是爲全國性學生運動大聯合的開始。同時該會以北大成員爲主者成立了「國民雜誌」，支持的包括各城各校學生，雜誌於一九一九年元旦出版創刊號，正與「新潮」同日問世。「新潮」主要致力於助長一種純粹的文學和思想革命，「國民雜誌」則欲聯合新知識份子和民衆共進愛國行動。

一九一八年五月學生的示威請願，還顯示出較清晰的社會力重組，它表露了新舊兩股勢力的衝突，在這衝突的另一面，新商人和工業家開始與新知識份子共同反對政府的政策。一次大戰後期，日本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已變成中國工商業的致命威脅，北京政府對日的讓步，無法指望贏得這些工商團體的同情，他們基於愛國主義

，抗議中日的軍事協定。當時幣制的統一又告失敗，許多地區的混亂造成國內貿易劇烈受損，內戰又花費了繁重的稅款，加上現存法律頗礙工業之發展，凡此都使反對政府的新興勢力更增怨意。

新知識份子業已合作致力於摧毀政府內外保守派的意念和倫理基礎，當然急切與新經濟力相聯，因此一九一八年五月學生和商人的請願，實已提供了這種聯合的試驗場，但要到次年它才完全成熟。

五四事件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事件是旋風中心，也是整個五四運動的漩渦，在隨後的活動中，知識份子和新經濟力基於愛國主義的一種聯合，有力地表現出來。其間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得以大為流行，救國的情緒也已聚集，整個運動的力量和影響達到高峯，最後改革者逐漸分裂成各種派別，造成後來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社會力重組。

五四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凡爾賽和會對山東問題的處理。從一次大戰開始以來，中日關係就成為中國最緊迫最煩惱的難題。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對德國致送最後通牒，要求在一個月內移交「膠州灣租借地全境」給日本，但同時又保證「終將歸還中國」。次年日本便佔據了膠州，最後及於山東省的大半。山東是孔孟出生、教學與逝世的「聖地」，又具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地位，日本不但顯示無意履行承諾，反而以嚴厲的二十一條加之於中國，並在一九一五年五月簽約。中國人先還以戰後列強會主持公道的希望來自慰，因此當一九一八年「雙十一」大戰結束後，國人欣喜有加，政府宣佈放假三天，各處都有真誠的慶祝，十一月十七日北京六萬人參加慶賀協約國勝利遊行時，大批的學生和教師也在行列裏。新思想領袖們在演說中表達了樂觀，報章雜誌的看法亦然，他們相信這次是民主戰勝了專制和軍國主義，工人和平民戰勝了壓迫者，也摧毀了秘密外交的理

論與實際。他們更假設德國從一八九八年以來對華侵佔的領土和利益都將歸還，大戰期間被迫簽訂的中日條約和協議，也將在繼起的和會中重獲調整，他們大多天真地相信，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和協約國的宣戰宗旨將在戰後實行。

然而，這種幻覺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爾賽和會開始後就不能持久。來自巴黎的消息顯示，日本正欲取代德國在華的地位，而且情勢可能較前更壞。起先展望和會時，中日兩國政府還互示友好之情，但雙方代表團甫抵巴黎態度就突然改變了，中國代表部份是因對日本的懷疑，部份是因國內輿論的壓力。當時國人及其代表的態度隨著南北政治的不協而分裂，陸徵祥被任命為總代表，他是一九五到一九一九年間的外交總長，曾於一九一五年簽署緣自二十一條要求的中日協約，廣州政府自始就反對他的任命。在各代表中，王正廷代表南方，顧維鈞顯受美國的影響而同情南方，南方擁護一種堅定的反日政策，並圖刺激民衆懷疑北京政府的親日態度。一九一九年三月和四月，中國及外人在華所辦報紙報導，代表團中只顧日本利益的影響力正在活動。在此情況下，從會議剛開始，猛烈的爭論就不僅發生於中日代表之間，且在中國各派代表間爆發了出來。

第一件從巴黎傳來震驚國人的消息，是日本代表於一月二十七日在五強（美、英、法、義、日）全體會議上宣佈，一九一七年二月，英、法、義三國會與日本簽訂秘密協定，保證戰後「支持日本對德國在山東權利處理權的要求」。日本在和會中的手因此伸得更直，而中國尋求支持的對象——美國則發現本身的孤立了。

尤有進者，中國軍閥政府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曾和日本商談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使得情況更形複雜，政府此舉意在建設山東省境內部份的濟南——順德和高密——徐州兩鐵路，結果兩路的一切財產和收入都做為借款的抵押品。當天日本外務大臣對中國提出有關山東問題的七點安排，據此日軍駐守膠州——濟南鐵路沿線者將集中於青島，而派一支隊於濟南，鐵路要由以日人為警長和教練的警力衛護，建成後由中日共管。對這些提議，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換文中覆話「欣然同意」，九月二十八日他便與日本簽訂兩鐵路借款預備合同。以上所有協議都保密到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凡爾賽的「十人協商」會議為止，中國全權代表中有些甚至

對此聞所未聞。

兩條鐵路的借款和有關山東問題的換文，提供日本在法律上的根據來要求權利。美國代表於前一天晚間從顧維鈞處得訊，立刻說明這些協議使美國助華發生困難，中國代表也爲此事而感窘困。他們答辯日本代表說，一九一五年的協約是在日本武力脅迫下簽定的，而且中國既於兩年後加入世界大戰，情勢則大有改變。日本代表則反駁說，一九一八年的鐵路合同和山東問題的換文是在中國參戰後做成的，因此並非在脅迫下。

在這些不利的情況下，中國於會議上失利了。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威爾遜、路易喬治和克里蒙梭這「神聖的三位一體」，在「四人協商」（義大利的奧爾多那多缺席）會上秘密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所有利益全都轉給日本，而不提及日本於一九一四年「終將交還中國」的保證。

除了在山東問題上爭辯外，中國於四月間曾向和會提出兩案，一是陳述「中國請求廢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兩國政府所訂之條約和換文」，一是調整下列七題：（一）廢棄勢力或利益範圍，（二）撤退外國軍警，（三）裁撤外國郵局及無線電報機關，（四）撤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恢復關稅自主。第二個提案是中國政府自動準備的，第一個則是留歐學生向代表團建議的。從和會開始以來，留學生爲了監視代表們，業已自行組織起來。但是，這兩個提案都遭到和會的拒絕。

四月二十二日威爾遜在四人協商會議中顯示動搖跡象，在此之前中國人似未過於失望，即在此後仍保持著些許樂觀。和會期間國內外的華人對中日外交的關心大爲增長，他們組織許多團體來支持和檢核駐巴黎的代表團，並公佈其活動，若干代表也試著與大眾密切連繫，文章、小冊子和新聞通訊都廣泛的流傳，至少使日本人感到有失顏面。中國人民對此極大的關懷，特別是新知識份子和商人之舉，並非僅爲政黨鼓動的結果，它反映了這些新團體的真實要求——免於殖民控制的威脅。南方確曾努力宣傳對日本和北京政府的憎惡，少數與國民黨或南方政府有關的能士，也曾到美、法兩國準備這種活動，但它不限於革命黨。進步黨（研究系）有時和其他軍閥在國會中聯盟，在當時也反對段祺瑞的親日政策，該系的領袖梁啟超遊歐時，北京政府任命他爲中國代

表團顧問，他亦於四月二十四日致電北京的國民外交協會，反對中國同意巴黎和約。

基本上更重要的是國內外華人在民間團體中對外交問題的討論，國內團體包括李盛鐸、王揖唐組成的國際聯盟同志會，和前述由林長民、張謇、王寵惠和其他進步黨與國民黨領袖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另外還有一廣東領袖們創設的外交調查協會。國人的關切更因顧維鈞和王正廷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正式提出議案而被喚起，結果代表團從二月七日到四月十日之間，收到八十六封發自全球各地的國人團體的來電，支持中國的要求及抗議日本在會中的提案，電報包括來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濟南、紐約、洛杉磯、柏克萊、檀香山和倫敦等地的十三個學生組織，以及在上海的留日歸國學生團體。此外還有三十二個工商組織和工會發出抗議，諸如北京中華總商會、檀香山中華商會、山東工業協會和廣州華僑工會等，再加上超過六十七個的政治和社會團體，諸如省議會、教育會，以及在美國、菲律賓、古巴、墨西哥、爪哇、馬來亞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各種華僑組織。

發電者強調他們相信和會保證的尊重人權，也相信中國不會承認列強間的秘密協定。北京學生的電文說：「北京中上學校學生宣誓支持各代表維護我國家之權利，希繼續支持到底。」來自山東省議會、商業及農業公會、山東教育會和工業協會的電文，則特別提到如日本的山東協定等秘密協定之實，「直接違反」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結尾要求「將中國從賣國賊出賣之危機中解救出來」。中國人的這種情感是可以理解的，當時的背景是：早期對和會結果的期望和樂觀，新知識份子對親日政府的戰鬪，以及新商人和工業家力求保持國內市場在戰爭結束時免遭日本的控制。

當巴黎和會要把德國在山東的地位讓給日本的壞消息，於四月下旬傳抵中國時，國人忽然跌入沮喪和憤怒的狀況裏，他們首先想知道誰該對此不幸負責。據報導威爾遜曾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四人協商會議上詢問中國代表：「一九一八年九月時協約軍顯然將贏得戰爭，日本不能再威脅中國，中國政府何以對山東問題的換文會欣然同意？」這啓發了國人的疑竇，認為政府並非被迫而是甘願出賣國權。幾天後，由於梁啟超拍回的電報指出

和會要把青島讓給日本，五月二日林長民就在報上評論說，和會原先計畫要得到有關國家的同意後，才將山東問題向五強（美、英、法、義、日）提出，現在却直接接受日本對山東的要求，中國就快被征服了。

此時中國代表因怕對失敗負責，就向國內報告：「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此報告載於五月一日的北京「中國時報」，其他報紙和外國教員也在五月三日透露給民衆，因此國人在五四事件前夕就知道了有關消息。學生們對威爾遜的理想與諾言的失敗，正式表達了他們的失望：「像是先知的聲音，威爾遜的話遍播世界，它使弱者強壯，使掙扎的人有勇氣。中國人一再聽說過了，……他們被告知在戰後締結的條約裏，像中國這樣不好鬻武的國家，將有機會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們也被告知，秘密盟約和被迫協定將不被承認。他們尋求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沒有太陽爲中國昇起，甚至國家的搖籃也被偷去了。」

一位北大畢業生後來描述五四前幾天學生情緒的不安，以及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失望：「巴黎和會的消息最後傳到這裏時，我們大爲震驚，立刻就覺醒外國仍是自私和軍國主義的，而且都是大說謊家。……我們深知自己與政府無關，也不能再依賴所謂偉大領袖如威爾遜的原則。看看我們的同胞和可憐無知的大衆，我們不由得感到必須奮鬥！」

知者對當時情況開始看出預兆。蔣夢麟說：「甚至在五四示威之前，有些新教育運動的領袖們視察學生不安的精神，就預言過有些事會發生。」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是這運動的就近觀察者，也描述過五四前夕中國人對巴黎和會決定後的失望和驚醒。而中國學生這種沮喪和憤怒的情緒，到了五月初就轉爲猛烈的示威遊行，以抗議「政府中的賣國賊」和列強在巴黎的決議。

在詳述中國特別是北京學生對凡爾賽危機的反應之前，注意他們的特性和氣質是很重要的。中國學生尤其從二十世紀初起，具有一種較西方民主國家者更活躍的政治和社會意識，他們更傾心於參與公共事務及嘗試政

治改革，這種特性可由不少因素來解釋。

首先，中國多次被羞辱地擊敗，對手正是她先前視為野蠻和低下的外國，加上腐敗及分裂的政府，延續的內戰，落後和崩潰的經濟等，在使青年知識份子驚慌。他們的教師慣於訓誨日後要做國家的救星和希望，所以任何對國家和文化光榮的傷害，都使他們較其他團體來得敏感，同時也覺醒到具有影響力的學生政治運動的長久傳統，以及做為少數能讀寫一種困難語文的特殊地位，因此他們理所當然的重視自己對公共事務和救國的使命。尤有進者，中國學生早在心理上準備參加社會和政治活動，一九〇五年科舉廢除後，他們便以當羣衆行動的領袖為彌補。正如羅素的觀察，中國的改革者或革命家因此不像西方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變成憤世嫉俗的大儒主義者。生活在一個缺乏真正立法機構或選舉制度的國度裏，他們看到改良被阻撓，民意被壓制，這種情況令人憤怒，也使他們以反抗和抗議為解決之道。舊秩序既然顯得如此無望，新奇事物和現代主義對青年的吸引力就增強了。當時大專學生領袖都才二十出頭，他們的許多同學和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不超過十九歲。一九一九年活躍的傅斯年、段錫朋和羅家倫等都未滿二十三足歲，供給新思想的教授們也都只二三十歲。相反的，反對派的舊學者大多年過耳順，軍閥領袖也在中年以上，彼等和大多數政府中人都受過帝制的舊教育，迥異於新知識份子所接受者，這種差異遠超過普通的兩代之間。教育與觀念的矛盾，造成青年學生無法忍受政府和校方的許多觀點和行動。

另外幾個因素也促進中國學生參加羣衆活動。他們慣於同住擁擠的宿舍，研讀或娛樂都是團隊行動，集體和合作的態度勝過個人主義，這在比較理想化的知識青年中格外普遍，他們聚集於都市中心，習慣上和思考上皆與父母遠離，少受影響。羣衆行動的技巧如示威、罷課和抵制，若非由歸國學生引介，就是從國史和西方出版物中學得，這些知識份子有了第一次大戰時在歐洲勤工儉學和工讀的經驗，使他們和西方勞工運動的優越經驗拉近。另一方面，中國輿論對學生干涉素無強烈的反對。

北京學生還有一特點。幾個世紀以來活躍且具野心的知識份子，聚在這個傳統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多

數志在做官享權，很少人留心外交政策、社會問題或新思潮。然而，一次大戰快結束時，尤其是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在北大進行改革後，學生的氣質受到相當的改變。五四事件前夕，北京的大學生可按特性分類成三種：一是執樁子弟的殘餘，仍過著多少有些奢華腐化的生活。次為用功的學生，致力讀書超過對時事的留心。三為最受新觀念影響的一羣，他們僅佔學生全數的五分之一，但是却最活躍，密切注意內外事件，且對社會、文化和知識問題深具興趣。與其他同學相較，他們吸收了較多的西方思想，閱讀了較多的西方文學——易卜生、托爾斯泰、莫泊桑、克魯泡特金和蕭伯納等，一種使命感和懷疑精神遍佈其間，就是這些學生領導了稍後的學運。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中國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抵北京，學生組織包括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工學會、同言社和共學會等，開會決定在五七國恥日舉行民衆示威，此項決議迅速獲北京所有大專學生團體的贊同，並由北大、北高師、工專和法政專校領導，同時他們也為示威遊行擬好計畫。由此可知五四事件的近因，不只是在巴黎的不幸所致，也是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條要求引起的憤怒之延續。在該會上，學生又決定向全國各新聞機構和公共團體發電如下：「青島歸還，勢將失敗，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國民當有覺悟，望於此日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以保危局。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全體學生二萬五千人叩。」

會後的五月一日到三日，巴黎傳來的消息更令人震驚。據報導和會即將拒絕中國對公正解決山東問題的要求，此因賣國賊前已「欣然同意」換文。這時駐日公使章宗祥正由東京匆促返國，他在天津停留數日，政府中另一著名的親日官員陸宗輿，即到天津與他商談。四月三十日章到北京並未宣佈返國目的，並住在曹汝霖家中——雖然他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次日外國報紙說章將不返任所，謠傳他會繼任外長和巴黎和會總代表，這更引起了民衆的懷疑。五月三日北京民衆的情緒達到高熱，各種政治和社會團體都緊急開會，力求挽救此局。國民外交協會派代表去見總統徐世昌，請他命令駐巴黎的中國代表，山東問題若不能合理解決時當拒絕簽字。留日學生救國團也致電總統：「公開決絕勝過屈辱求生。」

在這種民衆壓力下，北京政府却採取嚴厲的手段來鎮壓騷動，造成民怨益增，在京學生感到有提前遊行的

必要，一羣最活躍的學生鑒於情勢緊迫，五月三日下午一時在北大貼一通告，召集北京所有大專學生代表臨時集會，該會於當晚七時在北大法科禮堂舉行，參加學生逾千人，由易克嶷主持，易是國民雜誌社的領袖之一，對新舊文化問題採溫和的態度。會中由北大新聞研究會的邵飄萍分析山東問題，繼有許多學生做激昂演說。會中通過了幾個決議，最重要的是決定於五月四日召集北京所有大專學生舉行羣衆大會，抗議政府的外交政策。後來一位北大學生追述該會說：「我們起初討論國家的危機，都同意造成山東問題的是腐敗和不公，我們學生應奮鬥向世界顯示，『強權絕非公理』」。後來又討論了四種進行之道：（一）聯合全國人民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拒簽約，（三）通電各省人民於五七國恥日遊行，（四）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舉行大示威，表示我們的不滿。在會場中有位法科學生謝紹敏，當衆破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字，全場肅然。」

五月三日晚間的集會，顯然是在高度情緒的氣氛下進行的，但仍井然有序，而且大多數的學生及其代表都無意在預定的遊行中出現暴力，該會主要由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的會員主持，他們大多自始就不認可暴力行動，整個遊行似乎經過仔細的準備。不過，有些急進團體也計畫將此遊行變成不僅是有秩序的抗議。五三臨時會議前後，許多小型的學生團體，秘密和公開的在各校討論遊行的方法和步驟。據報導有些團體在會中計畫攻擊三名親日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曹是交通總長和交通銀行總理，章是一九一六年以來的駐日公使，陸是幣制改革局總裁兼交銀董事長，以及中日合辦滙業銀行的華方董事長，皆被視為北洋政權中最親日的官員。

學生在五月三日決議改變遊行的日期，顯然已為北大當局所知，在此之前，蔡元培曾召開一次教授會議討論學生活動問題。因為軍閥政府對大學的敵意，以及他們自己憤怒政府在中日問題上的軟弱立場，因此教授們不願阻礙學生的活動。五四前夕蔡曾召見學生領袖之一的狄君武，據報導他表達了對學生的同情。

五月四日是星期天，上午十時學生代表依約在法政專校相聚，準備遊行事宜，他們來自十三所大專學校：北京大學、高等師範、滙文大學、法政專校、工業專校、農業專校、醫學專校、警官學校、鐵路管理學校、稅

務學校、中國大學、民國大學、朝陽大學。此外，陸軍學校也派學生代表列席。在延續一個半小時的會議中，採納了五項議案：(一)通電國內外各團體，呼籲他們抗議和會的山東決議，(二)努力喚醒全國民衆，(三)安排北京民衆大會，(四)成立一個永久及聯合的北京學生組織，(五)該日下午的遊行路線是由天安門出發，經過東交民巷和崇文門大街等商業區。在這次會中，學生代表對決定重要事務展示了可觀的效率與協調。

下午一時半左右，三千名以上的學生集聚於天安門廣場，準備參加遊行示威，他們代表前述北京十三所院校。此時北京政府已在努力阻止大會，一名教育部代表隨同若干軍警官員，於上午十一時便抵達北大，並由蔡元培在場勸導學生不要加入遊行，但經與該代表長辯之後，學生們拒絕聽勸，這段插話唯一的作用便是延遲了北大學生的趕往集合地點。

當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前的廣場時，他們順序排列，按校分組，一名北大學生向大家介紹教育部代表，該代表勸學生們返校，以後再推人向政府及各使領館交涉，以免人數過多。步軍統領李長泰和警察總監吳炳湘，也勸告放棄遊行。學生並未接受，他們充份體認到請願或遊行都不會速達目的，只想公開表示對軍閥和強權政治帶來國恥的憤怒反抗。在大會和遊行中他們分發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印刷傳單，說明遊行示威的目的：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

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篇宣言是羅家倫用生動簡明的白話文所寫，反映出文學革命的效果，被視為青年知識份子精神的最佳表達。此外還有一篇用文言文寫的較正式的宣言，也為這次會議所採納，當時雖未印發，事後却流傳全國：

嗚呼國民！我最親、最愛、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企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已有由五國公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黯無天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望、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上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公管，儕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者，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是亡山東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拱鄂、寧，營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之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撒、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奮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髮，幸共圖之！

下午二時會議結束後，學生們從天安門南經中華門開始行進，隊伍前頭由兩名警衛手舉五色旗，隨後是一

副帶有諷刺意味的中國傳統式輓聯：

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這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北京學界淚輓

除了向旁觀者散發傳單外，學生還舉着用布或紙做的白旗，寫繪上中、英、法文的標語和漫畫，以表達他們遊行之目的和情緒。標語可分成如下兩類：

(一)「外爭主權」或「外抗強權」的：如「還我青島」、「頭可斷青島不可失」、「誓死力爭青島」、「取消二十一條」、「中國被宣判死刑了」、「拒絕簽和約」、「抵制日貨」、「保衛國土」、「保衛主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民族自決」、「國際公理」、「反對強權政治」。

(二)「內除國賊」的：如「打倒賣國賊」、「賣國賊曹汝霖」、「處死賣國賊曹、陸、章」、「國民應判決國賊之命運」、「勿僅愛國五分鐘」。

北京民衆對遊行的印象極為深刻，許多觀衆靜立街邊傾聽學生高呼口號，感動得流下淚來，不少西方人向他們歡呼脫帽致敬。遊行的行列井然，童子軍和小學生亦加入並發傳單。由政府派來的警察和密勤人員，也未發覺學生有任何暴力的意圖。

但在遊行的後期，學生們的心情改變，也不再如前的規律了。他們經過中華門向東轉，到達東交民巷的西邊入口，巷警阻止學生入內，在與外國官員通了幾次電話以後，包括羅家倫在內的四名學生代表被約進美國使館，恰巧芮恩施公使出外旅行，他們就留下說帖，希望「予吾中國以同情之援助」。

學生代表發現英、法、義的公使也都不在，就在各使館分別留信。他們等候約兩小時之久，巷警仍不准隊伍通過該區，同時中國軍警也圍住入口，強烈干涉並圖迫學生退後。在這雙重失望和壓力下，學生及其他加入的市民變得憤怒起來，忽然他們大喊：「到外交部去！」「到賣國賊家裏去！」此瞬間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已無法把握局面，於是學生們北沿戶部街和東長安街，到東單牌樓和石大人胡同，一路高呼賣國賊的名字，連段祺瑞和徐樹錚也包括在內。大約下午四時半，隊伍抵達靠近外交部的趙家樓二號曹汝霖宅。直到這時一切尚未真正失去控制，羣衆要求曹親自出面解釋與日本簽訂密約的原因，而守門的軍警對此充耳不聞，反圖強迫學生後退。被激怒的示威者於是高喊「賣國賊！」許多人向窗口投擲石塊和白旗，五名不妥協的學生爬牆破窗而入，宅內一打以上的武裝守衛爲之受驚而未抵抗，讓他們打開前門，於是大羣學生湧入。學生們在屋內遍尋三名親日份子不着，激怒中搗毀所有家具並放火燒屋。此際約下午五時左右，有些學生發現了章宗祥在一間起居室中（曹本人實際在家同坐，但臨時躲進臥室夾層的小箱間裏），立刻將章打倒在地，他就躺著裝死。混亂中學生看到起火，害怕做得過分，於是許多人散開返家或回校。日本記者中江丑吉和警察趁機扶章逃出，但他又被另批學生在附近拖住打昏，後被警察送到日本同仁醫院。據報導，章在天津的房子也同一天遭學生搗毀。曹汝霖不久化裝成僕人從窗口逃出，由車載到東交民巷一家外國人擁有的「六國飯店」裏。陸宗輿則不在現場。

混亂中警察和學生在院子裏也有些爭執，然而當時警察的態度頗爲溫和，其中有些人實際上保持著一種「寬仁的中立」。但接到高級長官幾回緊急令之後，他們被迫採取干涉，結果雙方皆有所傷，延續到五時四十五分，那時大多數的遊行學生都已散去，警察總監和步兵統領率屬抵達，他們才向空鳴槍，遵命在現場和沿街逮捕了一些人，結果有易克嶷、許德珩、江紹原、楊振聲、熊天社、曹永、李良驥、向大光等三十二名學生被捕。學生被捕後東交民巷一帶立刻宣佈戒嚴，救火員趕往曹宅，直到晚八時才將火勢撲滅。大學生燒掉賣國賊房子的消息，却立即傳遍了京城。

這事件旋爲中國政治和社會圈留下深遠的印象，話題最多的是曹宅門前簡短衝突的事實：警察與學生之間

地上的雲

(增訂再版)

簡 宛 著

定價40元

郵購八折

「地上的雲」承續「葉歸何處」的閃亮，一樣地洋溢著生命活力，一樣地充滿愛心，當然也一樣地讓您感到一股躍然的悸動，而且比以前更恆久。您若看過「葉歸何處」，更應該看「地上的雲」。

書 評 書 目

一九二七四號

並沒有激鬧。最早的報導之一說：「這對當地觀眾而言，似乎是非常大的諷刺。此人為整個北洋軍籌款及武器，透過他的夥伴可以指揮數十萬人馬，却被羣衆在自己屋內舉事，而且沒有人為他實際開一槍或盡一力。」從上所述似乎明顯可知，遊行示威純為一種學生憤怒的公開表達，結果演成了大多數學生不能預料的騷動。他們主要的動機是忠實的愛國主義，但假如沒有五四事件後的發展，遊行示威的重要性就有限了，也許只能算做學生反對軍閥和抗議列強對山東問題議決的表示，或者如少數不諳此運動來龍去脈的觀察者所言，認為只是一次青年羣衆的暴動——至少是激烈派的暴動。

而北京學生在事後立即開始組織全國新知識份子，來支持他們的目的。他們也嘗試藉由宣傳、大會和遊行等，贏得一般民衆的同情。在這過程中，他們開始和不識字的廣大人民建立起更密切之連繫，並獲得新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強大有效的支持。從此學生的新思想遍傳全國各城，古舊的文明開始碎裂，新的社會政治發展亦已行進。五四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上所以能佔獨特的地位，得力於這些結果之處，超過遊行示威的本身。